

# 法国大革命期间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及其服饰表达

文 / 郭丰秋

**摘要:** 本论文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女装时尚入手,探讨期间复杂的女性形象,揭示法国妇女社会角色的变化。在革命前,大多数人对女性的期待停留在男性的取悦品角色上。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遭遇强烈冲击,两性关系出现变化,妇女们开始关注时事,甚至发出追求男女平等的呼声,通过服装行为表达其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热情,从而造就不同的妇女形象。

**关键词:** 妇女社会角色;女装时尚;法国大革命

大革命(1789-1794)前的法国是一个男权社会。在传统性别体制下,除了极少数如“贞德”或有所作为的王后、宠妃外,妇女的首要职责是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政治是男人的专利。在基督教文化中,夏娃是为了取悦亚当而被上帝创造的。相应地,妇女着装方式往往围绕着男性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传统的性别体制遭遇重创,妇女们不安于家庭角色,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甚至发出女权主义的呼声。服装作为一种符号语言,能够将抽象的思想具象化,有助于推动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改革。因此,大革命时期妇女们利用服装表达其政治热情,努力改变其社会角色,向男权社会提出挑战。

## 1 法国大革命前作为取悦品的妇女及其服饰形象

法国大革命前,人们认为,女性的天职是取悦男性,启蒙运动领袖卢梭也持这种观点<sup>[1]</sup>。这个时候,女性装扮自己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炫耀财富,而且是顺应这种天职。“时尚几乎一天几变”,其目的便是帮助女性取悦男性,以实现

男女关系的和谐发展<sup>[2]</sup>。为了博取男性的青睐,妇女们想尽办法装扮自己,用紧身胸衣、裙撑等衣具将自己塑造成纤弱柔美、弱不禁风的形象,这种着装方式严重损害了女性身体健康。除此之外,大革命前的妇女缺乏公共话语权,她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下,只有少数精英女性通过沙龙认识世界。即使在沙龙里,精英女性的工作也是掩盖自己的个性和才情,以优雅精巧的举止和谈吐激发他人的灵感。

18世纪欧洲技术和医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在着装上注重健康和机能性。人们认为,男性在生理层面较为强壮,适于参加户外活动,如散步、跑步等运动,因此,他们可以穿着便于走路的鞋子,男装的结构更便于活动。女装的廓形和结构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进入洛可可时代,但她们依旧要穿着十分标准的高跟鞋。这些鞋子彰显出她们温顺、柔弱的天性,抑制了妇女参与运动的热情和能力<sup>[3]</sup>。

尽管如此,大革命前法国妇女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和提高。随着法国被卷入工业革命的洪流,商品经济冲击着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文化比较研究》(10YJTA60047)

作者简介:郭丰秋,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师

有助于妇女摆脱传统社会角色的束缚。在服装行业里,最初的设计师、裁缝等职业基本上由男性占据。随着服装市场的扩大,许多女设计师和女裁缝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些女商人因其个人能力和产品,获得业界的肯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露丝·博迪。她是巴黎极具天分的服装设计师之一,“她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业界声誉的重要性”<sup>[4]</sup>。并非所有的妇女都像女性从商者一样成功改变其社会角色,但后者的成功激励着其他妇女,并预示着女性社会角色在大革命期间会得到进一步改变。

## 2 法国大革命期间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及其服饰表达

大革命期间的妇女形象有些复杂,原因在于大革命产生的思想和政治激荡使妇女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影响女装时尚的因素很多,时人对妇女社会角色的期待各不相同,因此,妇女着装方式也十分大胆和混乱。

### 2.1 古典女性形象与新古典主义女装

古典母亲形象源于法国人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向往。18世纪中叶,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赫库兰尼姆和庞贝两大古代都市的发掘引起人们对古代文化的重新关注,“朴素、高尚、平静而伟大”的古典文化吸引着好奇的法国人。

此外,工业革命使法国服装制造业和服饰加工业更加兴旺,服装制造较以前更为迅速,服装时尚周期相对缩短,大多数女性沉迷于购物,这令法国社会的理性人士十分忧虑。一些知识分子指出,妇女天性中的柔弱和虚荣容易使她们道德沦丧。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她的挥霍无度为法国带来灭顶之灾。据此,人们希望自然而质朴的母亲形象来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

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提倡的“回归自然”也对法国女装时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认为,服装产业正用狂热和华丽的东西腐蚀着

自然美。而古希腊和古罗马女装的色、形、质具有健康、自然的审美特点。于是,洛可可风格女装开始向新古典主义风格转变。

图1是1790年的时装画,画中女子穿着时兴的修米兹长袍,该长袍是用白色细棉布制作而成,服装面料十分轻薄、柔软,裙子很长,往往垂到地上。从画中可以看出,洛可可末期夸张的头饰已经消失,她解下了紧身胸衣和笨重的裙撑、臀垫。



图1: <http://www.blastmilk.com/>

图2是1791年的女性,图中修米兹连衣裙的腰际线被提到乳房底下,胸部内侧有护胸层,袖子很短,可以露出玉臂。整体造型简洁、流畅,如同希腊女神一样高贵,又如希腊



图2 <http://www.blastmilk.com/>

世界里恬静、祥和的母亲,这正是反奢侈潮流下法国社会所呼吁的女性形象。

### 2.2 革命妇女与爱国女装

法国大革命前,服装时尚与政治潮流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但到了革命时期,在反奢侈、反阶级差别的压力下,服装行业改变以往的营销策略,将政治观念与着装方式联系起来,讨好顾客和政府。于是,女装时尚的政治色彩浓重起来,成为标识着装者政治态度的符号。正如服装杂志所宣传的,如果你想表明对新制度的拥护,就应该穿上平纹棉布制成的长裙,佩戴由白、红、蓝三色组成的花朵。如果你想支持教士等级,那么就穿上小丑似的红黑两色的短上衣<sup>[5]</sup>。

大革命期间,古罗马和古希腊故事以及古

典美德对女装时尚影响很大。红色是罗马共和国的经典颜色,代表着自由。大卫在《帕琉斯和海伦》中塑造了一个头戴红色弗里几亚帽的资产阶级形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帽子是自由的象征,也是团结人们反抗专制的信号。不久,小红帽和三色徽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符号,三色服装和装饰在女装时尚中迅速流行起来。图2中的女性腰系三色缎带,正在向国民公会捐献珠宝,支持革命。她们面容圣洁,使人联想到罗马故事中伟大的妻子或母亲形象,后者将家中男人送往战场,保卫罗马共和国。

此外,也有穿着英式罗布的时髦女性。如



图3:<http://www.blastmi1k.com/>

图3和图4。这种服装受到英国军事着装风格的影响,这种服装便于行走和骑马。但有意思的是,图3中的女装装饰着三色缎带和三色徽,她手中耍弄的玩具悠悠

(YoYo)也是红、白、蓝三色。图4用简洁的白色和红色传达出大革命时期常见的共和主义气息。

### 2.3 平等妇女与女着男装行为

较之以前,大革命期间的法国妇女更加关注政治局势和国家荣誉。当大革命爆发时,下



图4:<http://www.blastmi1k.com/>

层妇女和男人们一起走向街头,为了面包、平等和自由而战。除了消灭等级差别的平等外,妇女们也呼吁实现两性平等。

对法国人来讲,小红帽代表民族的再生,对妇女而言,

小红帽表示可能建立起新的性别秩序。1791年9月,女作家奥林普·德古日发表《妇女与女公民的权利宣言》,强烈抗议压迫妇女,主张妇女应享有一切男人的权利。小学教师萨尔在1790年成立了一个“男女友爱社”,准许妇女在那里出席会议、参加表决并走上讲坛发表演说<sup>[6]</sup>。

一份署名“B. B. 夫人”的陈情书写道:“妇女的准则是勤劳、服从和沉默,这确实是一种与无知的世纪相符的制度。今天,知识和理性已经证明了它的荒谬。妇女有理由要求获得选举权,因为她们和男人一样,承担缴纳王国赋税和履行雇佣合同的义务。”另一份自称为《法兰西妇女的陈情书》写道:“三级会议的组成,就概念来说,它既然能代表整个民族,也就应该代表我们。可是,民族一半以上的人口却被排斥在外。先生们,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伤害的是我们这个性别。”还有一份致国王的请愿书写道:“我们要求受到教育,要求获得工作,不是为了侵犯男性的威望,而只是为了受到尊重,为了使我们获得摆脱厄运的谋生的手段。”<sup>[7]</sup>这说明,一些妇女已经认识到传统的性别体制对女性造成的歧视和伤害,希望从法律层面消除自古以来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

确实,大革命期间,对女性的称谓出现了变化。之前用来称呼男人和女人的“先生”(Sir)和“小姐”(Lady)被斥为封建遗瘤,人们用“男公民”(ci toyen)和“女公民”(ci toyenne)代替。但要注意的是,在之前的法语中,“公民”只有阳性形式,专指男性。这说明,女性不再囿于母亲或妻子的形象,而是与男性比肩而立。

1793年春,有不少妇女获准加入无套裤汉的各民众社团。1793年7月,一个名为“两性无套裤者社会和谐社”的民众社团明确规定:“将一视同仁地接纳女公民参加本社的爱国主义活动。”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克莱尔·拉孔勃的

女演员还成立了清一色由妇女组成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sup>[8]</sup>。该俱乐部并不专门讨论妇女问题,而是像男人的政治俱乐部一样大谈国事,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曾积极投身于5月31日至6月2日的起义,为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吉伦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着装方面,革命妇女认识到,三色徽、小红帽、无套裤不应该是男性的专利。1790年的一些时装报刊甚至向妇女们推出了一种被称作“制宪服”的朴素时装,到1792年这种时装又被配以流行于共和派中的小红帽而成为一种“平等装”<sup>[9]</sup>。政治热情极高的平等女性往往头戴小红帽,佩戴三色徽,甚至身穿长裤参与民众社团的议事活动。这些行为表明,大革命期间,妇女的社会角色开始出现了短暂的转变,“女公民”的流行说明,妇女摆脱了纯粹的家庭主妇的角色,具有与男人同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她们在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中的消极形象出现变化,而女装时尚则是妇女社会角色的媒介或载体。

然而,法国大革命期间,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妇女头戴小红帽、身穿长裤,走出家门参与政治,时人对妇女社会角色的认识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在大多数雅各宾派人士看来,妇女由于其生理构造方面的原因,不宜直接参与政治,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国家效力,比如呆在家里操持家务,照料孩子和丈夫,参加政治集会时应该默默旁听,有意见的时候只能在家里向丈夫发表。

作为受益方的妇女群体骨子里也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认识。一些革命妇女意识到,由于“造化的强制要求”,男人与女人在参与政治的机会上是不平等的,而妇女可以在忙完家务之后去履行公民的职责,以表达对公益的热爱。被誉为大革命“预言家”的马拉也认为“妇女不应该承担任何公共事务,而应该通过家务来体现自己

的价值”<sup>[10]</sup>。妇女头戴小红帽、身穿长裤等行为预示着她们将要打破性别秩序,争取在政治事务中与男人平等,而这是违反造物主的安排的。可见,大革命虽然扫荡了封建传统的旧意识,但性别歧视的幽灵始终回荡在各种场合。男人们一方面追求他们自己的“天赋权利”,另一方面将妇女视为其天然附属品和潜在的“敌人”。

### 3 结语

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社会性别意识产生了强烈冲击,为妇女社会角色的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服装所具有的政治符号意义则有助于为妇女塑造强烈的趋向于男性的革命认同感,也促使广大妇女社会角色意识逐渐觉醒,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然而,传统性别体制的历史影响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消除的,法国女装时尚在大革命后又向浪漫主义风格转变,女性身体又被束缚在紧身胸衣和裙撑的牢笼里。即便如此,大革命期间妇女社会角色的短暂转变是现代女权运动的先声。

### 参考文献:

- [1][5] Ribeiro, Aileen. *The Art of Dress: Fashion in England and France, 1750-1820*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 58.
- [2] Jones, Jennifer M. *Repackaging Rousseau: Femininity and Fashion in Old Regime France* [J].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994(4): 939-997.
- [3] McNeil, Peter and Giorgio Riello. *The Art and Science of Walking: Gender, Space, and the Fashionable Bod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Fashion Theory*. 2005(2): 175-204.
- [4] Crowston, Clare Haru. *The Queen and her "Minister of Fashion": Gender, Credit and Politic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Gender & History* [J]. 2002(1): 92-116.
- [6][8][9] 高毅. 法兰西风格: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M]. 江苏: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121. 124. 219-220.
- [7][10] 刘大明.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性别歧视与女权运动 [J]. *世界历史*, 2007(4): 74-75. 79-80. 81.

(收稿日期: 2012年11月14日)